

# 試述伊格爾頓思想的神學維度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Eagleton's Theology

張良叢

Zhang Liangcong

**Abstract:** Eagleton is a Marxist and a theologian. He approaches religion from the angle of dialectical analysis. He criticizes its negative value and affirms its political value. To him, Marxism and theology are not contradictory but complementary on the shared platform of political criticism.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his theology is a requisite to understanding Eagleton's thought as a whole.

**Keywords:** Eagleton, Marxism, theology

特里·伊格爾頓可謂是當代聲名顯赫的理論家，其學術影響遍及很多領域。在中國大陸，他的著作已翻譯有十多種，為中國學人所熟知。但是，一提到他，我們的第一反應是作為文學理論家的他，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他，作為文化理論家的他。似乎，大家很少注意到，作為神學家的他。在國外，同樣如此，詹姆斯·史密斯在年前出版的研究伊格爾頓的新著中，同樣是如此寫到：“目前，伊格爾頓的名字更多地與文學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領域相

聯繫，人們很容易忽略他最初的主要著作和作為知識份子的活動是在天主教神學領域的。”<sup>①</sup>的確，作為多產的理論家，伊格爾頓的學術影響主要在於文學和文化批評領域，並且我們中國對伊格爾頓的譯介也主要是從文學和文化批評的角度進行的。但是我們縱觀伊格爾頓的學術歷程，他雖然經歷了多次學術轉向，但是神學的因素在他的思想中或隱或現，始終伴隨著他的思想進程。近些年來，伊格爾頓的新著更是顯示出其神學轉向的特點。

伊格爾頓是信教的，他自己始終沒有回避這個問題。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是相信基督的。60年代初我還在劍橋求學的時候，就參加了基督教或者說天主教左翼運動，當時我們就創造了一個新事物，即探索政治和神學的關係。……我一直對研究神學(形而上學)和政治之間的關係感興趣。我的著作曾一度離開這個主題，但近年以來，我又回到這個主題。”<sup>②</sup>由此可見，伊格爾頓是實實在在的基督宗教信徒。青年時代的伊格爾頓就開始信仰天主教，並參加天主教左翼運動，並把神學與政治的關係確立為研究主題，神學的因素直接成為他學術起步的重要基地，並且最近他有開始返回這個主題的傾向。因此，作為神學家和天主教信徒的伊格爾頓也不應為我們的研究所忽略，神學的維度是理解伊格爾頓思想的重要參照系。

伊格爾頓最早踏入學術研究的領域是在1960年代。那時，英國出現了一場激進的天主教左翼運動，作為一個只有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伊格爾頓積極地參加了這場運動。天主教左翼運動的主要目

<sup>①</sup> James Smith, *Terry Eaglet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8), 9-10.

<sup>②</sup> 王傑，徐方賦：《我的平臺是整個世界——特裏·伊格爾頓訪談錄》，《文藝理論與批評》，2008年第五期。

的是挑戰天主教教會的結構和信仰，與新左派對話。它作為一個有影響的政治運動出現，與教會爭辯，從而導致了梵蒂岡的第二次具有進步意義的改革。天主教左翼運動創辦了一個雜誌《傾向》（*Slant*）。創刊時，這個雜誌主要是以劍橋大學的青年作為編輯，並且圍繞《傾向》這個雜誌形成一個小團體，伊格爾頓是該雜誌的主要創立者之一。《傾向》雜誌成為他們主要的理論陣地。《傾向》雜誌以及圍繞它形成的小團體得到了英國新左派知識份子的支持。雷蒙德·威廉斯等很多著名的新左派理論家都為這個雜誌寫過文章。在某種意義上，新左派的知識份子為《傾向》雜誌小組提供了政治語境和理論資源。《傾向》雜誌的目的就是架構起左派和教會中那些人的對話的橋樑。在這個小組中，伊格爾頓負責宣傳，同時也積極地為這個雜誌撰稿。這個雜誌是作為 1960 年代英國天主教一個傑出進步思想的陣地，既介入天主教教會自身的爭論，也涉及到很多具體的社會問題。在這個語境中，伊格爾頓從各個方面寫作文章，介入這些問題，形成了系列的成果，為雜誌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史密斯所說的那樣，“伊格爾頓給傾向雜誌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從詩歌、書評到隨筆和爭辯學。”<sup>①</sup>

早年的伊格爾頓關於神學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兩本：《教會的新左派》（*The new left church*）和《作為語言的身體》（*The body as language*）。他早期的著作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要證明，天主教信仰是唯物主義者政治運動的重要倫理背景，激進的政治運動和天主教思想並不矛盾，社會主義者和天主教思想的矛盾是可以調和的。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和基督教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架構的，相互對話的。在《政治和禮拜儀式》這篇文章中，伊格爾頓對天主

<sup>①</sup> James Smith, *Terry Eaglet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8), 16.

教的聖禮中的禮拜儀式進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他想做一個實驗，想看看在多大程度上，當代馬克思主義和現象學的語言能運用於禮拜儀式的分析，從而把神學和當代文化批判聯繫起來，用神學的語言進行文化批判。伊格爾頓第一本著作《教會的新左派》就是關於“教會、文學和政治”的，他勸說教會中的基督徒應該對想像性的文化做出應有的貢獻；他展開了用一種激進的基督教的觀點進行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文化批評，例如對利維斯的文學分析，與威廉斯、霍加特等新左派知識份子的論爭，嘗試的都是一種與基督教觀點的對話。在這本著作中，作為文學研究者的伊格爾頓，把文學作為重要的中介，以此來思考文學是怎樣引導我們去獲得人類價值和社會的最為真實的狀況，是怎麼樣與基督教相聯繫的，成為研究的重要任務。例如伊格爾頓認為普通生活的觀念和緊張的觀念是當代生活的一個重要的分裂。對於這個觀點，他通過對現代悲劇和詩歌的研究進行了闡釋。他指出，現代悲劇使我們看到個人和社會怎樣在資本主義社會所創造的異化中相互對抗，這個事實同樣能在現代詩歌中能夠發現。在青年馬克思對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與物的關係的分析的啟發下，伊格爾頓闡釋了英國詩歌的相似的異化體驗。他詳細解讀了華茲華斯的《孤獨的收割者》，揭示出浪漫主義詩歌的欺騙性和危險性。和資本主義一樣，這種詩歌是一種危險的不道德的生活方式，這種批判在詩歌和政治之間找到一種平衡，通過文學來診斷社會的異化狀態。但是如何解決這種異化狀態？我們看到，伊格爾頓轉向重新審視基督教神學觀念來獲得理論資源，他說耶穌的形象為人類提供了終極的狀態。同樣，伊格爾頓在《批評與意識形態》中，進一步闡發了這個觀點，指出教會藝術和政治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提供了屬人的基本的東西。在《教會的新左派》中，伊格爾頓嘗試用基督教的觀點理解現代悲劇和詩歌，解構傳統的區

分所造成的障礙。基督教反對資本主義；基督教的教義是政治教義，關於人的共同生活而不是孤獨生活的教義；為了社會改革，基督教走向了它的進步方向；這些都是伊格爾頓面臨新的問題提出的對基督教的新的理解。《作為語言的身體》是伊格爾頓早期最後一本關於基督教的最為重要的著作。它揭示了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和分歧，借助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理論的觀念重新思考基督教的墮落和救贖的問題。伊格爾頓指出人類墮落的狀態的唯一特徵是進入語言世界，在人類面前打開了既是破壞性又有創造性的語言潛能。他在此書中探索的問題是作為語言動物的墮落的人怎樣逃避具體化（reification），分裂的體驗。其中，禮拜儀式作為早已存在的沒有具體化的集體，特殊的象徵體系，在逃避具體化和分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督不是要建立一個孤島對抗墮落的社會，而是要共建一個人類社會，創造一種共同的文化，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具體化和人類身體的分離才會得到避免。最後，他指出激進的基督教神學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是一種補充。在這本書中，伊格爾頓充分的表達了激進的基督教的可能性。但是，這本書的一個設想創立共同的文化，作為伊格爾頓 1960 年代最有建設性的設想，還是體現出他一貫的文化批判的立場。

伊格爾頓在所接受的理論資源有很多方面，學界比較清楚的是以威廉斯為代表的英國傳統，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但對於伊格爾頓的神學思想的來源可能未必清晰。因此這個問題有必要交代清楚。伊格爾頓所受到的神學淵源來自兩個人，一個是哈波特·馬克布（Herbert McCabe），另一個是勞倫斯·布拉特（Laurence Bright）。

馬克布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天主教思想家。他 1965 年建立神學雜誌 *New Blackfriars*，並且寫作了大量的著作闡釋他的思想。他的

著作《新創造物》(1964)、《法律、愛和語言》(1968)代表了其核心的思想。在這些著作中，他把托馬斯·阿奎那、維特根斯坦和馬克思聯繫起來，在宗教和倫理方面架構起這些思想家的理論資源。這些方面深深地影響了伊格爾頓的著作。例如在《法律、愛和語言》中，馬克布提出一個觀點：人類社會既是一個生物學的團體，又是一個語言學的統一體。伊格爾頓的《作為語言的身體》這本書就深深地受到他的這種觀點的影響。可以說，他對伊格爾頓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不次於威廉斯的影響。因此，伊格爾頓在《甜蜜的暴力》中，提到以此書來紀念馬克布，顯示出馬克布對他的深刻影響。即使在伊格爾頓的1980年代之後著作中也有著他影子（在修辭和論證策略方面）。因此可以說，作為文化理論家的伊格爾頓繼承了神學家馬克布的方向，對天主教信仰的結構進行了分析，以此來理解當代社會的問題。第二個對其有深刻影響的人是勞倫斯·布拉特。他是《基督徒和世界自由》的編輯。伊格爾頓在《看門人》(*The Gatekeeper*)中清楚地提到，布拉特給他以深刻的影響，使他明白基督徒和激進主義者是不矛盾的，可以同時存在的。這個影響也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看到伊格爾頓著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在建構二者的聯繫，把他們同時作為理論資源吸納進自己的思想中。

1970年代後伊格爾頓逐漸從社會主義神學轉向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文化批判。尤其是1980年代之後，天主教新左派的影響在伊格爾頓的著作中逐漸淡出了。但是，我們縱覽伊格爾頓的著作，卻驚奇地發現，其中仍然浮現出神學的影子。神學已經成為其思想的內在營養成分融入到其觀點和分析中。例如，在1981年出版的《沃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批評》中，伊格爾頓繼續發揮了《作為語言的身體》的觀點，他指出：“當本雅明論及意義對語言的令人悲哀的玷污和邏輯性對語言的束縛時，他流露出了對人類墮落前純

潔語言的懷舊之情。”<sup>①</sup>在這段話中，我們明顯感覺到其 60 年代思想的重新浮現。

新世紀以來，伊格爾頓又發生了一次新的學術轉向，他把自己的這個變化，稱之為“神學轉向”。他先後出版了自傳《看門人》（2001），《甜蜜的暴力》（2003）、《理論之後》（2003）、《神聖的恐怖》（2005）、《生活的意義》（2007）等著作，在這些著作中體現了他的“神學轉向”。在《神聖的恐怖》中，伊格爾頓在談到恐怖的觀念研究要還原到其原始的語境中，進行形而上的研究時，說道：“同樣，它屬於形而上或神學轉向（或者是繞圈子），這是我的著作近些年來顯示出的傾向”，<sup>②</sup>《甜蜜的暴力》中，伊格爾頓重新思考悲劇、犧牲和窮苦人（anawim）問題。而這些問題與基督教文化緊密相連，伊格爾頓從具有政治意義的啟蒙神學觀念出發，重新討論了這些問題。同樣，在《理論之後》中，伊格爾頓指出了世俗批判理論的局限性，想重新返回道德、死亡、“虛無”（no-being）等問題，關注宗教的政治任務。“耶和華總是不得不提醒他那些病態的，喜歡崇拜的子民，救贖是一種政治事務，而不是宗教的。”<sup>③</sup>在《生活的意義》中，他批判了神學家對意義問題的誤導，提出人類獲得最終的意義是通過參與共同的建設性的文化來獲得的，這個觀點是在 1960 年代的《教會的新左派》中提出的。我們看到，伊格爾頓新著中凸顯的這些問題都直接來源於 1960 年代，伊格爾頓似乎有重返 1960 年代的趨向。由此可見，宗教在伊格爾頓的思想中，不單純是一個過往的研究主題，而是成為他思考哲學問題的一個重要的參照系。對此，史密斯指出，新左派教會展現的很多理論問題

<sup>①</sup> 特里·伊格爾頓：《沃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評》，郭國良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5 年，第 24 頁。

<sup>②</sup> Terry Eagleton, *Holy Terro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reface.

<sup>③</sup>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New York: Penguin, 2003), 175.

和主題，伊格爾頓在後來的著作中都嘗試解決。“伊格爾頓在 1960 年代捲入天主教新左派不是僅僅作為他的一個新奇的背景，而直接成為他後期著作轉變的一個基礎。”<sup>①</sup>

對此，我們必須清楚，伊格爾頓是一個學者型的基督徒。與一般的信徒不同，伊格爾頓對基督教並不是盲信的，他是站在一定的價值立場上，對基督教進行了批判性的認識和分析。而這恰恰是與他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有著直接的聯繫。在《甜蜜的暴力》中伊格爾頓是這樣分析宗教的：“宗教，也許尤其是基督教，已經在人類事物中造成難以講述的浩劫。……在許多方面，宗教今天都代表作用於這顆行星的一種可惡形態的政治反應，對人類自由的一種扼殺，以及對有錢有勢者的一種支撐。但是還存在在政治學意義上具有啟蒙性的神學觀念。”<sup>②</sup>在《理論之後》中，伊格爾頓在談到基礎主義的時候，也對基督教進行了批判，“如果上帝是世界的基礎，那麼他明顯是極其草率地創造出一切，這需要好好的解釋清楚。”<sup>③</sup>同樣，《在生活的意義》中，伊格爾頓也對神學家進行了批評，“哲學家把它分成真問題和假問題，神學家要對假問題負大部分責任。”<sup>④</sup>對於，宗教的這種批判態度根本就不是普通的信徒所能做出來的，這種批判性的分析態度，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或許，我們把伊格爾頓稱為“文化基督徒”更為合適一點。

伊格爾頓的神學研究有個一以貫之的主題就是神學與政治的關係。他沒有把二者對立起來，而是把二者作為互補的理論資源加以結合。在最近給《福音書》寫作的導言中，伊格爾頓還是堅持了

<sup>①</sup> James Smith, *Terry Eaglet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8), 31.

<sup>②</sup> 特里·伊格爾頓：《甜蜜的暴力》，方傑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第 9 頁。

<sup>③</sup>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New York: penguin, 2003), 195.

<sup>④</sup> Terry Eagleton, *The Meaning of Lif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這樣一種思路。“耶穌是個革命者嗎？無論在任何意義上，列寧或托洛茨基都不會被這樣提問。這是因為耶穌身上的革命性比他們更少，還是更多嗎？更少，的確，因為他並不宣導推翻他所反對的政權結構。但他之所以那樣做，原因之一是他期望那個政權很快就會被一種更加完美的形式所取代，其公正、和平、友誼和生氣勃勃遠遠超過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想像。”<sup>①</sup>這裏，很明顯，伊格爾頓把耶穌的行為當做一種特殊的革命行為。神學也是政治的一種，能夠給人類的未來指向另一種不同的出路。由此，伊格爾頓近年來的“神學轉向”，雖然是繼續了1960年代的主題，但是與1960年代的並不是一樣，它是在更高層次上，把這個主題推進到文化哲學反思的高度。他反思了宗教的關於人類的一些根本性的主題的答案，並與當代文化中遇到的問題相聯繫，從而超越後現代思潮解構終極價值帶來的價值虛無，給理論之後的人們帶來新的反思的武器，重建人們生存的美好家園——共同文化。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伊格爾頓，同時又是一個神學家。這個特點在我們中國的語境，似乎是很難理解的。因為我們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宗教二者不是相容的關係，而是不相容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更不可以成為宗教信徒。所以，我們看到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伊格爾頓，同時又是神學家和宗教信徒，往往產生一種怪異的感覺。其實不然，伊格爾頓本人也指出：兩者“在西方不存在這樣的矛盾。西方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像瓦爾特·本雅明就是猶太教的。當然馬克思主義和神學會有一些矛盾，但也有不少人可稱為馬克思主義神學家，或者叫做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的神學家。……我想兩者結合已經有相當一段歷史了！……實際上，如今對神學感興

<sup>①</sup> Terry Eagleton, *The Gospels: Introduction*, (London: Verso, 2007).

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會在許多宗教具有壓迫人民的本質這個問題上和馬克思唱反調。馬克思關於宗教的論述，主要觀點是正確的；但我們知道，他是將宗教作為意識形態進行探討的，而在神學中，宗教是批評意識形態的”。<sup>①</sup>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必須注意到，西方語境與中國的差異。西方語境這兩者不是矛盾的，而且兩者的結合已經在很多思想家和神學家的著作中表現出來。

另外，對於這個問題，除了中西語境的差異外，也應該看到對宗教的有兩種理解。在伊格爾頓那裏，其實宗教應該分為兩種。一種是具體的宗教，伊格爾頓對這種宗教是持批判性態度的，認為這種宗教代表了一種落後的意識形態，限制了人類的自由。我們在伊格爾頓的著作中，到處都能看到了他對這種宗教的批評，如2001年出版的自傳《看門人》，也有這樣的批判。“天主教與現實的關係也是一種空洞、貧乏的關係。”<sup>②</sup>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宗教觀是馬克思主義的，具有批判性。另外，作為一種形而上的思想的神學和神學。對於這個部分，伊格爾頓看到的是其建設性的價值。宗教和神學關注的是人類生存的終極價值，悲劇、犧牲、死亡、道德這些問題直接關涉人類生存的終極問題，以此可以直接否定和批判現實生活中存在的某些不合理之處。在此意義上，伊格爾頓就可以把馬克思主義和神學架構起來，使二者能夠完美的結合。因此，伊格爾頓所謂的神學研究和神學轉向，更應該是在這個意義上的，關注的是政治學意義上具有啟蒙性的神學觀念。這種神學是有特殊價值的，能和文化理論相容的，所以，“你不能把理性和神秘性看作互不相容。”<sup>③</sup>如果從這個意義上的神學來理解的話，伊格爾頓

<sup>①</sup> 王傑、徐方賦：“我的平臺是整個世界——特里·伊格爾頓訪談錄”，載於《文藝理論與批評》，2008年第五期。

<sup>②</sup> Terry Eagleton, *The Gatekeep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1), 30.

<sup>③</sup> Ibid. 32.

的神學傾向就沒有歧義，非常容易理解了。對此，美國學者麥克馬洪也有著類似的看法，他指出，“如果伊格爾頓要澄清他的超自然主義，將不會讓任何現存的宗教得到寬慰。……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麼人間的事物就不會有差別。或者，他也許會贊成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就是在基督教教義中，已經創造出該宗教關於社會的絕對真理。”<sup>①</sup>應該說，這個看法是正確的，宗教中的形而上的思想層面，是其一個重要的指向。理解宗教的這兩個層面的區分，伊格爾頓思想的神學傾向就具有了特殊的理論價值。

由此，我們看到，伊格爾頓的思想雖然是龐雜的，但是其核心思想，除了應該注意到馬克思主義之外，神學的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這兩條線索是互補的，相互闡釋的。同時也要注意，馬克思主義和神學的結合有一個理論的語境，就是政治批評。在關注現實缺陷的基礎上，進行的政治批評，它構築起人類美好的未來。或許這樣，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神學家，伊格爾頓才能更好的為我們所理解。

#### 參考文獻：

- 1、James Smith, *Terry Eaglet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8).
- 2、Terry Eagleton, *The gatekeep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1).
- 3、Terry Eagleton, *Holy Terro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4、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New York: Penguin, 2003).

<sup>①</sup> 克利夫·麥克馬洪：《論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版，第 226 頁。

- 5、Terry Eagleton, *The Meaning of Lif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6、特里·伊格爾頓：《沃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評》，郭國良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5 年。
- 7、特里·伊格爾頓：《甜蜜的暴力》，方傑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年。

作者簡介：張良叢，哈爾濱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電子郵件：[zhangliangcong@sina.com](mailto:zhangliangcong@sina.com).

**Introduction of the author:** Zhang Liangcong, Lecturer of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